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一

战时中国各地区

杨天石　庄建平　编

《战时中国各地区》是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论文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时的情况，为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读者对象：社会科学工作者、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一·

战时中国各地区

杨天石　庄建平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一·

战时中国各地区

编　　者 / 杨天石　庄建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 ssap. com. cn
网站支持 /（010）6526996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 ssap. 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李正乐
责任校对 / 王玉珍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010）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6. 4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58 - 2/G · 0049
定　　价 / 45.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中国各地区/杨天石，庄建平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一）
ISBN 978-7-5097-0558-2

Ⅰ.战… Ⅱ.①杨… ②庄… Ⅲ.日本-侵华-历史-文集 Ⅳ.K265.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2313号

目　录

序　一 …… 傅高义 / 1
序　二 …… 杨天石 / 1

伪满洲国的政权体制和基层社会组织 …… 解学诗 / 1
日本对“满洲国”社会的统治及渗透
…… 塚赖进 著　孙彩萍 译 / 23
日本推行“满蒙政策”与统治“蒙古联合自治
政府” …… 卢明辉 / 46
兴亚院及其中国调查 …… 久保亨 著　孙彩萍 译 / 73
变调的“雨夜花”
——战时台湾几个面向的观察 …… 邵铭煌 / 107
抗日战争的地域性影响：广西 …… 戴安娜·拉瑞 / 130
河南的粮食短缺和日本的粮食掠夺活动 …… 吴应銧 / 147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
…… 魏宏运 / 169
战时江西省国民党统治下的后方区 …… 墨　轲 / 189

日本奴役强制中国劳工研究
——以中国青岛地区为例 …… 庄建平 / 219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强掳虐待
华北劳工述论 …… 居之芬 / 246
华北地区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和
日本人的反战活动 …… 井上久士 著 孙彩萍 译 / 273
上海沦陷区的中国医生 …… 魏克曼 / 290

序　一

傅高义*

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我们还组织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规则。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标准。

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经济和科学事物那样具有均质性。文化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人联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文化的差异，不同种族、民族的认同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危险在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将会相互碰撞，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本不必冲突，但要消弭这些冲突，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去寻求相互理解。我们必须加快这种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步伐，使之像环境与资源利用问题那样满足越来越强烈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德国与其邻国波兰、法国等之间的

---

* 傅高义（Ezra F. Vogel）为哈佛大学亨利·福特社会科学荣誉教授。

商贸往来发展得很快。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来自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相互协商，相互理解，克服数个世纪的战争阴影，开始了漫长的和解过程。尽管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问题依然存在，但欧洲已在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一体化进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亚洲，由于中国的内战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使得二战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讨论历史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1945～1952 年，日本被盟军占领，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在占领期间，日本领导人不可能与中共领导人有密切接触。1952 年，日本结束被占领后，冷战又阻止了中日之间进一步接触。有相当一段时期中日领导人之间没有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开始和解，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间和解开始于 1972 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但是由于在 1972 年两国迅速建交，两个民族没有机会在邦交正常化之前来解决历史问题。当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努力想实现两个民族间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随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中日间新问题的出现，和解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

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是中日之间的隔膜已成为影响亚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的、最长期的障碍。中日两国在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需要共同协作，不仅是消极地避免冲突，而且要积极地解决环境、能源短缺问题和防治传染病等。要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国文化间的深层差异，特别是历史记忆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成为理性寻求两国间共同利益的最根本的障碍。中日间问题的解决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日间的文化差异、历史记忆问题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亚洲地区将不会有真正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二战前出生的一代学人，我是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既对中国又对日本感兴趣的学者之一。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因此

我尝试去理解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我是研究当代社会的，自 1958 年首次在日本开展田野调查以来，我便开始频繁地接触日本人。1961 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当时中美关系不是很密切，我没有机会前往中国开展调查。因此我不得不从外部开展研究工作。但是自 1973 年参加美国访华代表团和 1980 年在中山大学访学两个月后，我开始同中国人建立起个人间的友好往来。我对中、日两国人民和文化深怀敬意，在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友人。自 1958 年以来，我至少每年访问一次日本；自 1980 年以来，我开始至少每年访问一次中国。

我的专业虽然是研究中日两国的国内社会，但是由于接替费正清先生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负责哈佛大学的美日计划，并创立了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越来越对改善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逐渐地转向研究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1993 ~ 1995 年，我任职于美国政府，成为美国有关东亚方面智囊机构的官员。1996 年我负责领导汇编“与中国共存”的研究计划。1997 年，我非常荣幸地负责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到哈佛大学访问。

2000 年，我从正式教职岗位退休，以便专心从事研究工作。我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尽量帮助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亚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邓小平先生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于是我选定这一研究方向，其目的是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作为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与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中日两国间的深层症结在中日战争，因为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我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和解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但

我相信，如果中国、日本与西方学者通过共同研究，对各自的歧异均能有清楚的、客观的了解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各方学者均能认同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那些希望促进各个国家间的和解以便进一步实现大家共同利益的政治领袖们，便会根据学者们的成果来实现其政治理想。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中国和日本都遇到了一批持有相同学术理念的杰出学者。他们都认识到客观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一些敏感议题开展共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对那些对中日相互和解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想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而言，这种学者间跨国界的共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前，有关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材料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没有方便地为学者所利用。一国学者所熟知的史料，另一国的学者则知之甚少。为了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相关专题，让不同国家的学者彼此了解对方的史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而搭架桥梁。

在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杨天石先生负责召集中国方面的优秀学者来研究 1937～1945 年的中日战争。在日本，由山田辰雄、平野健一郎两位先生为主要召集人，并由卫藤沈吉先生提供协助，负责召集日本学者开展共同研究。

我不是研究中日战争的专家，我只是为研究中日战争的西方学者提供一些学术上的组织与协调。我所召集的西方学者有：戴安娜女士、麦金农先生和马克·皮特（Mark Peattie）先生。

组织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召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学术研讨会，需要那些相信有必要对敏感问题开展共同研究的多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非常容易遭到来自本国的爱国者的攻击。这些爱国者认为战争的历史是政治议题，并非历史问题。

这种跨国共同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远非一般学术会议可比。为了保证对话的质量，我们必须翻译所有的与会论文，并拥有同声翻译。来自各国的学者虽然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家对会议的安排均非常配合。

筹备会议于2000年在东京召开，次年我们召开了首次正式会议。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夏威夷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军事战役问题。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讨论的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希望第四次会议能在中国召开。

为了让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决定让来自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组织者分别整理并出版各自的论文集。会后，各国学者都认真修订并重新改写了论文。英文版的第一卷论文集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由麦金农、戴安娜和傅高义负责编辑。第二卷也很快要出版，由马克·皮特、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和方德万（Hans Van derven）负责编辑。前两卷的日文版也已出版。现在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文版也即将面世。我们希望这些论文集的出版将会增加大家对各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的了解，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吸收、借鉴。

（罗敏 译）

序　二

杨天石*

战争是个大怪物，可怕的怪物。它毁灭生命、财产，制造不幸、灾难、悲剧，吞噬、毁灭人类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之间进行过的战争已难以数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难以数计。以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为例，据不完整统计，这次战争中，中国人牺牲2000多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多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人。如以1937年的美元计，中国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这样的战争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此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自然可以避免，中国国家的面貌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自然，战争多种多样。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例如，一个国家为统治、奴役另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侵略国家为维护自身的独立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又如，压迫者、剥削者为维护一己私利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为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生存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两种战争性质不同，不可以一概反对。当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被

---

* 杨天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剥削者不得已而选择战争这一形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时，理当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同情。这是战争史的基本常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不分是非，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是错误的，绝不可取的。

然而，战争毕竟是一种无比巨大的破坏力量，能够避免要尽量避免。如果人类能够有其他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么，还是不用战争这种形式为好。中国古代的圣人老子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后来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曾经根据老子的思想，加以发挥，写过一首题为《战城南》的诗，描写一场鏖战后的战场惨景。诗云："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中国人民自古就热爱和平，但是，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对战争，其原则是"不得已而用之"。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消灭战争。毛泽东，这是一个大半生南征北伐，靠战争打下江山的历史巨人。他当然深知战争的功用，但是，他也深知战争的残酷，主张消灭战争。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

消灭战争，就要研究战争。从 2000 年起，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即联络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上一世纪的中日战争（1937～1945）。这是一场对中国、对亚洲、对美国，也对日本自身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记住它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共同保卫和平。我很赞同傅高义教授的这一想法，积极参与其事。记得 2002 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时，论题是"战时中国的各地区"。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东西方的学者围坐一室，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各抒己见。特别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会议的中日两国的学者各有十余人，虽然有争论，但气氛融洽。这使我想到，当年，这两个国家的士兵相互

对阵、仇杀，而今，两国学者友好相处，同席论文。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会议闭幕的那天，我曾经当场写作并朗诵了一首小诗：

曩时对阵两相分，
而今同席共论文。
武战何如文战好，
鹅湖辩难为求真。

宋朝的儒学有“理学”和“心学”之争，相互对立，形同水火。公元 1175 年（南宋淳熙二年），“理学”派的大师朱熹和“心学”派的大师陆九渊在江西信州的鹅湖寺相会，进行辩难。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但是，所使用的武器仅止于唇舌，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辩论之后，友谊仍存。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值得提倡。

有人群的地方，就难免有分歧，有争论。或为意见之争，或为观念之争，或为利益、权力之争。怎么办？诉诸“武战”嘛，不好！还是要用“文战”，即讨论、辩论、协商、谈判、表决等方法为好。或服从真理，或取决于多数。倘若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习惯于用这些“文战”的方法来代替“武战”，那么，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也就消灭了，和谐世界也就出现了。

应该说明的是，当年交战国双方的学者以及其他各国的学者共同回顾、总结当年的那场战争，由于各自的背景、环境、视角不同，观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这是正常的，也是不难理解的。相信读者会以宽宏的态度对待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相信学者之间的交流、切磋以至“文战”，会有利于对那一段历史的全面、深入的认识。

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一项国际共同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的新的研究课题是“战时国际关系”，已有中、日、美、英、俄等国的许多学者决定参加。有关研究成果完成后将继续结集出版。

伪满洲国的政权体制和基层社会组织

解学诗*

中国东北地区（下称东北），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是日军占领时间最久、日军制造的统治机构最为完备的地方。本文主要阐明举世皆知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体制的本质特征和遭受侵略战争严重冲击破坏但具有极大反弹力的东北基层社会的组织状况，以期能对战时中国各地区政治状况的对比研究有所帮助。但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作宏观的概要表述。

一　伪满洲国政权的二重构造

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策划武装占领东北的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就提出：通过武装占领，推翻地方统治，扫荡官有财产，实行以大将或中将为总督的军政统治。[①] 1930年底由关东军第三课完成的《对占领地统治的研究》，也主要说明从局部到全面实行军政统治的步骤问题。1931年3月和5

*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①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第40页。

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更明确地主张："必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①] 石原和板垣的主张，是和侵占全中国以及最终同苏美进行大战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四天——1931 年 9 月 22 日，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参与下，由板垣、石原等人所制订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案》[②]，却提出了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首脑的统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的新政权。接着，参与制造事变的满铁社员松木侠和金井章次又分别提出了建立"东北自由国"和"满蒙共和国"的方案。11 月初，关东军还向中央上报了一个《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③]，内称："将满蒙作为我领土之一部分，实属上策"，但"目前如急于付诸实施，有可能遭到国际间的物议"。当时面对顾虑国际反应而举棋不定的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关东军和满铁都强烈主张：不能只满足于出现亲日政权，至少也必须建立一个"满蒙国"。十月事件之后，特别是到了进攻锦州前夕，中央的态度终于一致。1932 年 1 月 13 日板垣从东京带回的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一致商定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规定："满蒙目前作为由中国本部政权分离独立的一个政权统治和支配地区，逐步诱导其具有一个国家的形态。"[④] 就这样，制造一个"国家"的政策被确定下来，这种政策自然有别于关东军原来所主张的对占领地区实行军政，或直接划入日本领土。

---

①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塙书房，第 139～144 页；《太平洋战争の道へ》别卷，资料编，第 101～107 页。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 189 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 1 卷《"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 372～384 页。

④ 该"要纲"1932 年 1 月 6 日制定，后于 1932 年 3 月 12 日由内阁通过。

但关东军根本没有“逐步诱导”的耐心。它利用事变后东北三省地方当权派的迅速分化，早已网罗了汉奸和亲日派，并阴谋唆使他们在各地进行“独立”活动。经过土肥原在天津制造事变，11 月初宣统帝即被偷运到东北。进攻锦州后，关东军由于得到了中央的如上认可，更急不可耐地三步并两步加紧“建国工作”。然而，经历六年天津日租界生活而亲日化了的溥仪却大失所望。日本唯恐因溥仪重又“登基”引起清朝复辟运动的燎原大火而无法收拾。所以，当 1932 年 3 月 9 日“满洲国”成立时，溥仪无奈接过来的是“执政”的头衔。执政制，是既反对复辟又不许共和的准帝制，这种体制长期延续有导致共和制之虞。到了 1934 年，日本侵略者认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已初步站住了脚，便把既定的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的国策付诸实施了。溥仪当了两年的“执政”后，终于又重登“大宝”，但是他这一次未能龙袍加身，穿的却是所谓大元帅正装。尽管如此，早已人格政治化的溥仪总算重又当上了皇帝，还是飘飘然的。由日本一手制造的以溥仪为皇帝的所谓满洲帝国，作为一个政权，各种统治机关一应俱全；从伪满洲国的历史全过程来看，它所发挥的政权职能也不亚于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暴力统治机构。问题在于，当时东北的领土、主权不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早在 1932 年 3 月 10 日，即溥仪就任“执政”的翌日，即以换文形式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密约。[①] 日本通过此项密约，除固定军事占领和夺取铁路交通命脉外，在控制伪满政府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掌握了人事权，并确保了伪满政府任用日本人官吏。所以，密约签订的第二天，诸如“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等要害岗位的日本

① 满铁经调会：《“满洲国”关系条约集》，1934，打印本，第 9～11 页。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与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时，密约成了“议定书”的附件，但始终没有发表。溥仪战后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和在中国受审时，因畏罪也隐瞒了这一密约。